

■赵文斌

胡实声, 1913年8月出生在北京。他是江海关红色革命理念的播种者, 在近代洋人把持的江海关创建了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

1936年6月, 胡实声进入江海关工作; 7月, 参加中国共产党; 9月, 介绍彭瑞复、朱人秀入党, 随即秘密成立江海关党小组; 11月, 又发展冯华全入党。

1937年1月, 为统一上海党组织, 在上海建立的党组织一律明确归中共驻上海办事处领导。这样, 江海关党小组就从受中共北方局领导改为受上海工委领导。

1938年5月, 日本外交部次长掘内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秘密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 将沦陷区各关税存和后收税款由汇丰银行改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保管”, 并由伪南京维新政府财政部接收江海关。不久, 伪财政部任命的监督李建南和日本驻沪领事等人来到江海关, 带来了税款交伪政府支配、外滩江海关大楼上悬挂伪旗等命令。

消息传开, 江海关职工非常气愤。党支部决定开展抗议行动, 由支部书记彭瑞复具体领导。5月7日, 2000余名华员聚集江海关饭厅开会, 负责主持的人受到警告后退场消失, 会场一度冷场。眼看护关运动就要夭折, 胡实声挺身而出, 表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全场再度群情激昂, 当场组成护关运动委员会, 通过江海关华员反对汪伪海关监督接收江海关和悬挂伪旗的宣言。

第二天清晨, 护关委员会闻讯影响是巨大的: 运动的领导者挺身而出, 慷慨陈词, 表达中华民族不可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护关运动之后, 邮局、法院、学校纷纷以各种方式掀起护邮、护院、护校斗争, 推动这一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1936年9月江海关党小组成立时, 党员人数仅3人; 到上海解放前, 陆续发展党员54人, 调出和输送党员19人。可以说, 胡实声播下的革命火种, 历时13年不仅不熄不灭, 而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

(作者为上海徐汇海关党委书记、关长)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串联古代中外海洋贸易盛景

■程杨 武世刚

两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 市舶司在其间扮演核心角色。它不仅是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工具, 还像一把钥匙, 开启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的财富之门, 串联起一个空前活跃的中外贸盛景。

国之枢机

北宋立国之初, 于开宝四年在广州率先正式设立市舶司。之后, 随着贸易量激增和航线发展, 又先后在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立相关机构。

政和三年, 朝廷在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市舶务, 成为上海地区参与国家海外贸易管理的最早行政记载。这一机构的设立, 标志着长江入海口区域被正式纳入全国海上贸易管理体系。南宋时期, 随着政治中心南移, 华亭县作为临安(今浙江杭州)外围港口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为日后上海崛起成为贸易枢纽埋下历史伏笔。

宋代, 泉州“异军突起”, 正式设司, 并在南宋后期超越广州, 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同时, 密州、温州、江阴等地也曾短暂设立过市舶司或市舶务, 进一步形成了以广州、泉州、明州为主干的多点开花的港口管理体系, 清晰勾勒出宋朝海上贸易的主动脉。

一是“抽解”与“博买”, 对进口货物进行征税, 推行专卖措施。

“抽解”即对进口货物征收实物税, 通常税率在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之间浮动, 是市舶收入的基础。“博买”又称“官市”, 即对抽税后的珍稀货物, 如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 再进行强制性收购, 价格由朝廷规定, 通常低于市场价格, 并通过“榷货务”专卖, 获取超额利润。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南宋初期, 仅广州一港的市舶收入就达“岁入百万缗”。到绍兴年间, 全市舶总收入更是可观。南宋高宗就直言: “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 所得动以百万计, 岂不胜取之于民?”这一财政贡献在应对北方军事压力、维持政权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纲首”与“公凭”: 规范贸易流程, 提供交易便利。

市舶司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

《诸蕃志》记载, 与宋朝通商贸易的有五十多国: 海南诸国有三佛齐、阇婆、渤泥等; 向东有高丽、日本; 向西, 到中南半岛, 包括交趾、占城、真腊和吉兰丹等; 过麻六甲, 到印度洋, 则有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西天诸国”; 继续向西, 就是大食诸国, 以及非洲东岸诸国, 如层拔(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等。

在这一空前活跃的中外贸易网络中, 市舶司像一座精密的枢纽, 连接着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它的职能繁杂且系统, 主要目的是既确保朝廷财政之利权所在, 又活跃民间商贸市场。

三是“祈风”与“阅货”: 祈求航行平安, 防止走私和违禁品。

宋朝海船航行依赖季风: 每年夏初西南风至, 外商与本土商船抵港; 冬初东北风起, 则扬帆出海。相应地, 市舶司官员及地方长官会主持盛大的“祈风”典礼, 祈求航行平安。这既显示对贸易活动的支持, 也是一种文化仪式, 有助于增强与外商的情感联系。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至今保留有10处宋朝遗迹, 最早为淳熙元年, 最晚为咸淳二年, 记录了市舶司官员主持祈风仪式的盛况。

“阅货”则是在商船抵港后, 市舶司官员登船检查货物, 防止走私和违禁品, 系“抽解”与“博买”的前置程序。这一过程在宋代文献中多有描述, 展现了当时海关查验的严谨程序。多数货物在“阅货”后, 商人即可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特别是中国海商, 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商船出洋前, 必须向市舶司申请“公凭”(出海许可证), 详细申报船员、货物、目的地等信息。回航时, 需在原发港“回舶”, 并接受检查与抽税。《宋史·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公凭”的申请流程和内容要求, 包括船主、货主、船员名单、货物种类数量、航行目的地等, 堪称中国古代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这一制度既保障了国家税收和安全, 也为合法商人提供了官方保护和贸易便利。

对于引领商船、负责与外商交涉的“纲首”, 市舶司通常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和身份认定, 并利用他们来管理船队、维持秩序, 形成“以商治商”的高效管理模式。

四是“祈风”与“阅货”: 祈求航行平安, 防止走私和违禁品。

宋朝海船航行依赖季风: 每年夏初西南风至, 外商与本土商船抵港; 冬初东北风起, 则扬帆出海。相应地, 市舶司官员及地方长官会主持盛大的“祈风”典礼, 祈求航行平安。这既显示对贸易活动的支持, 也是一种文化仪式, 有助于增强与外商的情感联系。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至今保留有10处宋朝遗迹, 最早为淳熙元年, 最晚为咸淳二年, 记录了市舶司官员主持祈风仪式的盛况。

“阅货”则是在商船抵港后, 市舶司官员登船检查货物, 防止走私和违禁品, 系“抽解”与“博买”的前置程序。这一过程在宋代文献中多有描述, 展现了当时海关查验的严谨程序。多数货物在“阅货”后, 商人即可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万国梯航

1974年,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沉船, 残长24.2米, 残宽9.15米, 载重约200吨。船舱内出土的物品, 包括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朱砂、水银等, 与文献记载的进口商品高度吻合。

这一时期, 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其中, 宋瓷(如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精湛的工艺、优雅的审美风靡亚洲乃至东非。同时, 金银铜钱与铜器亦为“畅销品”。由于宋朝经济的发达, 中国铜钱成为东南亚和东亚许多地区的“国际货币”。这一时期, 书籍与印刷品也是不可忽视的出口商品。宋朝刻书业发达, 其典籍、佛经、医书等对周边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主要进口商品有: 一是香料, 如乳香、龙涎香、檀香、胡椒等, 主要用于饮食、医药和宗教仪式。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南宋绍兴年间, 仅乳香一项, 每年进口量就达数十万斤。二是珍宝, 如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等, 主要为了满足皇室和上层社会的需求。三是药材与原料, 如没药、阿魏、苏木以及用于造船的优质木材。四是书画, 如《清明上河图》等。

广州、泉州、明州等国际性港口的繁荣, 是市舶司有效管理的直接成果。据估算, 泉州港极盛期的年贸易总额高达数百万贯, 形成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伊本·白图泰记述: “渡大洋后, 所至第一城, 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 由余观之, 即世界上最大之港, 亦不虚也。”刺桐港

指泉州港。

宋朝的海船制造技术世界领先, 采用水密隔舱、指南针导航等先进技术, 确保远航的安全与效率。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 宋朝使臣乘坐的“神舟”长达三十余丈, 可载数百人。航海技术的进步, 使得贸易的规模、频率和范围都远超从前。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南宋初年, 市舶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5%至20%。海外贸易刺激了东南沿海手工业(如陶瓷业、丝织业)的专业化生产,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与之相伴, “重农抑商”的思想有所松动, 追逐海外利润一度成为风尚, 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商业化。

通过交往, 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传至欧洲, 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其中,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在宋代朱彧《萍洲可谈》中有明确记载: “舟师识地理, 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 阴晦则观指南针。”

总之, 宋朝通过市舶司体系, 成功地将自己置于早期全球化贸易网络的重要位置。从东非基尔瓦遗址出土的宋代钱币和瓷器到波斯湾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 考古实物证明了这一海上贸易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从中, 我们感触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商业繁荣, 更是古代中国的海洋气息、开放气魄。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

在江海关播下革命火种

大失克里夫秘密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 将沦陷区各关税存和后收税款由汇丰银行改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保管”, 并由伪南京维新政府财政部接收江海关。不久, 伪财政部任命的监督李建南和日本驻沪领事等人来到江海关, 带来了税款交伪政府支配、外滩江海关大楼上悬挂伪旗等命令。

消息传开, 江海关职工非常气愤。党支部决定开展抗议行动, 由支部书记彭瑞复具体领导。5月7日, 2000余名华员聚集江海关饭厅开会, 负责主持的人受到警告后退场消失, 会场一度冷场。眼看护关运动就要夭折, 胡实声挺身而出, 表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全场再度群情激昂, 当场组成护关运动委员会, 通过江海关华员反对汪伪海关监督接收江海关和悬挂伪旗等命令。

胡实声上台发言, 陈述护关运动的重大意义, 强调“我们反对敌伪接收江海关, 是维护国家主权, 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个人生活是小事, 国家主权大事是大事”。

护关运动迫使敌人取消在江海关大楼悬挂伪国旗, 引发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 直接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有力鼓舞了海关职工乃至上海市民的斗志。护关运动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运动的领导者挺身而出, 慷慨陈词, 表达中华民族不可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护关运动之后, 邮局、法院、学校纷纷以各种方式掀起护邮、护院、护校斗争, 推动这一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1936年9月江海关党小组成立时, 党员人数仅3人; 到上海解放前, 陆续发展党员54人, 调出和输送党员19人。可以说, 胡实声播下的革命火种, 历时13年不仅不熄不灭, 而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

(作者为上海徐汇海关党委书记、关长)

中华文明治水实践与智慧积累

体现了早期文明的成熟治水能力和综合治水理念。

之后, 大禹深刻观察水势、总结治水经验, 在“左准绳、右规矩”中“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川”。同时, 依靠伯益、后稷等有经验、有才能的人组织开展治水工作, 带领百姓“疏川导滞”, 进而实现“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相关治水理念被先秦智者进一步总结、提炼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社会治理理念。

都江堰、郑国渠和邗沟、鸿沟运河等工程是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的高峰。吴国开通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 魏国开通连接淮河和黄河的鸿沟, 使两国可以用成本更低的方式集中经济资源, 并向外报送战略力量。都江堰的三大核心工程, 即鱼嘴、飞沙堰、宝瓶口, 成功通过流体力学原理实现自动分流、排沙, 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

郑国渠工程实现了灌溉农田四万余顷, 使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从亩产一石上升到六石四斗, 有力增强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实力。

在世界历史上, 中国大运河可谓古代治水实践与智慧的最高水准。隋

唐大运河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 连接扬州、宁波和苏州的外销港, 把南北名窑的大量陶瓷运输至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周边。考古活动在扬州唐城遗址、唐苏州黄泗浦港遗址、唐宋青龙镇港遗址和宁波明州港都发现了大量外销陶瓷, 包括长沙窑、越窑、德清窑、邢窑、窑变、寿州窑。唐时, 太湖周边一带形成了以江南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德清窑瓷器得以不断运往外销港, 德清也因生产发展、人口增加而建县, 体现出古代中国特色水利工程的综合溢出效应。

为中华文明积累“治”慧——
水, 关乎农业兴衰、航运畅通、城乡安全。中国古人把治水视为极其重要的事务, 其中蕴含着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治国理政智慧。

一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如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而修建的灵渠运河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之称, 跨越南岭, 沟通湘江和漓江两个流域, 打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的工程智慧极高, 分南渠、北渠, 根据地势、地利修建了分铧嘴、大天平、小天平、泄水天平和陡门等多种工程设施。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唐开元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文献。其中, 首次以国家法规形式明确规定白渠水渠资源分配, 规定灌溉一般农田、大户碾磑(以水力启动的石磨)用水和航运等事项用水的先后次序。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其中, 分铧嘴是犁铧形的分水石堤, 可令上游水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 大小天平则是与分铧嘴相连的人字形梯形溢流坝结构, 高度符合力学原理; 陡门是“全世界最早的船闸”, 可以“弯道代闸”。灵渠修建至今长达2200多年, 仍在发挥航运和灌溉作用。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师, 体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共生共荣。

三是治水利民。
如, 吴淞江是太湖下游入海水道和泄洪通道, 穿过江南运河与外海沟通。唐末以后, 吴淞江常有淤积。从宋后周期至元明时期, 治理吴淞江成为历代官府要务。先有北宋良吏、苏州知州范仲淹提出采取“裁弯取直”, 后有北宋两浙转运使叶清臣裁直吴淞江(介于昆山、华亭之间)的盘龙江弯子。北宋嘉祐六年, 官府又裁直吴淞江中游的白鹤江弯子, 以进一步提高流速和排水, 减轻吴中水患。

周朝, 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 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 地位仅次于“三公”。战国时期, 水利官职逐渐细化, 有河丞、水工、水佐、水衡、都尉等。秦朝统一后, 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置都水长、都水丞, 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 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